

影响未来中美关系 发展之因素

● 蔡翠红

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一直是复杂的、非常难以定义的大国双边关系，合作与冲突同时存在。中美贸易摩擦扩大，美对华军事疑虑增加。但与此同时，中美贸易额稳步增长，中美在地区安全问题上的合作走向深入，高层交往的频率上升。2005年下半年开始，中美开展了首次战略对话，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及数位主管经济的高官访问中国，布什总统、胡锦涛主席互相访问。这种好坏交织的图像似乎不仅使当前的中美关系不易解读，也使未来几年中美关系的走势难以预测。在纵横交错的国际关系中，中美关系再次显现出其复杂性，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存在着若干变数。

一、结构性因素

中美关系恐怕是世界历史上最复杂的一对双边关系组合，双方结构性矛盾之多非任何其他双边关系可比。这些结构性因素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一）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分歧

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分歧属于文明的冲突，是异质性的拒绝和排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美矛盾本质上隐含着西方式价值观和中国式逻辑的冲突。美国以西方文明为中心，将非西方文明通称为异质文明，将中国的崛起当作儒家文明的复活，并认为这种异质文明的登场和发展是对西方文明的威胁。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中国作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事实，也让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把中国当作理念上的敌人。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存续本身就对建立美国式世界秩序形成重大挑战。从两国的焦点问题之一的人权问题中就可以看出中国和美国价值观和认识存在很大差异。^①人权问题曾经一度成为美国对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在美国内阁级官员访华过程中，每位官员都把“人权”和“宗教自由”作为谈话的重要议题。

美国对中国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影响经历了从“以压促

^① 张郁慧：“冷战后美国强化对华人权外交及其原因”，《当代世界》，2005年第8期。第46页。

变”到“以经促政”的思维转变。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美国寄希望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认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改革加上美国的压力最终会导致“自由化”。然而，最近10年美国认识到施压政策不可能改变中国，不论是克林顿政府还是布什政府都开始相信，通过在经济上融合中国能使中国在政治上发生变化，即从“以压促变”转向“以经促政”。当然，美国对华政治斗争还主要是停留在口头上，这说明美国政府尚未将意识形态分歧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在处理对华关系中还是以国家利益为重。

(二) 地缘政治摩擦

大国或大国集团是地缘政治格局的主宰。早在冷战期间，美国就已经认识到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对它的重要性，认为亚洲是世界五大力量中心中的四个力量间的相互影响地区。因而亚太战略一直是美国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美国即制定了“欧亚大棋盘”战略，将亚太地区与欧洲地区放在同一战略层次上考量谋策。^①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是全方位的，战略攻势是多功能的，最根本的是维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利益，防止该地区任何国家对美国构成威胁，达到主宰该地区的目的。中美在东北亚同样存在着安全矛盾。在东北亚地区四大力量中，作为美国同盟者的日本，是

^① 杨运忠：“对21世纪初叶美国对华战略和中美关系重大问题的思考”，《当代亚太》，2001年第5期，第7页。

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核心与关键。而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作为东北亚地区安全的维护者，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对中国至关重要。

在地区或地缘竞争问题上，双方的疑虑在逐步升高，这主要缘于冷战后亚太地区力量分配的变化。面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美国已隐隐感到芒刺在背，陷入既想引导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又担心中国强盛以后成为“敌对霸权国家”的矛盾当中。中国认为：美国正借“反恐”之名行对华战略包围之实。为了继续从战略上维护自身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和安全利益，美国利用一些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担心而联合盟国加强对中国的防范和制约。美日军事同盟的加强、美印军事合作、美国继续向欧盟施压，阻挠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等便是有力的佐证。而美国保守派人士则声称，中国正在构筑“亚洲版门罗主义”，中国的崛起及在亚洲的影响已经影响了美国在亚洲的利益。^① 只要中国作为实力正在上升的大国地位不变，只要中国还是美国的非盟国，那么美国寻求同亚太其他大国改善关系、防范中国的脚步就不会停。这是战略的、长远的趋势，是地缘政治的结果。

（三）崛起大国与既有大国之间的“天然对立”

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中实力的对比。冷战后美国学术界推出的“新孤立主义”、“选择接触”和“美国第一”等流

^① Robert Sutter, "China's rise in Asia—Are US interests in jeopardy?", *American Asian Review*, Summer2003, Vol. 21, Issue 2, pp. 1—21.

派皆由传统的现实主义演变而来。该理论强调：大国关系对于美国的安全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美国只要拥有绝对的优势力量，就能维护其“世界领导地位”。因而从现实主义观点看，中国崛起意味着可以对抗美国主导的现存国际秩序的唯一强国登场了，将不可避免地与美国发生摩擦。^①为此，美国应该首先处理好与现存和未来潜在大国及中国之间的关系，其次要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保持优势，以应对后者综合国力不断上升而对现存国际秩序可能构成的威胁及未来可能对美国“世界领导地位”构成的挑战。

“中国的崛起”已不再是新鲜的事实。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中国的国力和在世界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加之中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与美国之间存在的差异，中国的改革并非采取全面市场化，而是采取渐进和保守的方式，显示出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共存的发展模式，完全不同于任何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中国的发展对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构成了可能的挑战，并影响到美国的国际战略布局。其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各种形式的“中国威胁论”开始在美国盛行起来，认为中国的日益强大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构成挑战，甚至认为即使中国“和平崛起”，也同样是对美国的挑战。中美之间的诸多结构性矛盾正是因为中国迅速崛起这个特定条件而发酵和凸显的。

^①（韩）全圣兴：“‘中国的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变化”，《现代国际关系》2005年第11期，第47页。

(四) 台海问题上难以轻易化解的利害纠纷

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家安全政策绕不过去的结，跨不过的坎，也是中美关系发展中的又一结构性因素。领土是国家最为核心的利益，是国家最为基本的组成要素之一。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牵动民族感情、关乎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也是国家安全政策须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美国在外交上承认中国是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军事安保战略上却维持支持台湾的所谓“战略模糊性”，继续实施“双重遏制”和“双重保证”的台海政策，并将台海问题列入日美双边安全协定，既要遏制台独势力单方面改变两岸现状的企图，也要遏制大陆以武力改变两岸现状的努力。与此同时，美国既向大陆保证“不支持”台独，又向台湾当局保证中美关系的改善不会损害台湾的安全利益，并通过各种渠道提升美台军事实质关系，不遗余力地为台湾拓展所谓“国际生存空间”。^① 美国对台政策的矛盾性是美国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本性所决定的。

对中国来说，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而且没有任何退路。中国国防白皮书非常明确地指出：“台独就意味着战争”。美方已逐渐开始认识到台湾问题的严重性，如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曾清晰地表明台独就意味着战争，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政策倾向随时有可能因美对台的“政治好感”、

^① 姜德琪：“布什政府对台政策的回顾与展望”，《东南亚研究》，2005年第5期，第63页。

“军事支持”和“历史情结”而发酵，从而使中美形成“战略误判”，进而诱发冲突。台湾问题越来越成为中美关系中最危险的因素。

二、国际环境因素

除了结构性因素，当前的国际环境也给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蒙上了一层面纱。同为国际体系中的“利益攸关方”，任何国际环境中的新发展都可能对中美关系形成冲击。

（一）朝伊核问题

当今，朝核、伊核问题也成为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两大因素。若两核问题激化，中美关系必将阴影笼罩，产生不少摩擦。就朝核问题而言，不可否认的是，中美已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美国希望中美之间进一步加强协调，希望中国继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半岛的和平稳定，防止朝核问题失控。然而，中美两国虽然在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上立场一致，但在解决问题的方式上却存在着分歧。可以说，“朝核问题”是东北亚区域冷战的产物。多年来，朝鲜一直游离于东亚区域安全环境之外，其自身“不安全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美国的遏制理论和“先发制人”战略增加了东北亚地区安全形势的不确定性。如何在“六方会谈”的框架下，建立“朝核问题”与“朝鲜安全关切问题”合二为一的机制，最终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是中美的共同挑战。

就伊朗核问题而言，中国、欧盟、俄罗斯以至日本都同伊

朗有较密切的经济往来，伊朗也是中国的主要能源供应国，中国不赞成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和政治颠覆；而美国视伊朗为“邪恶轴心”国家，对其态度强硬，决不容忍伊朗的核计划。美国对伊朗的战与和同样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建设，因此中国应与其他大国合作来共同牵制美国。显然，美国对朝鲜和伊朗等国的外交举措可能会影响到中国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关系，从而在中美之间产生新的摩擦点，若处理不妥会对中美关系造成冲击和危害。

（二）外缘利益交叉

随着中国发展步伐的加快，国家利益外延必然相应扩展，从而一定程度波及美国利益已然深度介入的“第三方”范围。近年来，中国在欧盟、东盟、拉美、非洲的自然利益延伸，往往被美国刻意地解读为触及它的利益，进而引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例如 2004 年以来，中国与拉美国家高层交往频密，各类战略伙伴关系相继建立，经贸关系不断深化，这引起了美国各界的高度关注和警觉。美国舆论、右翼保守势力和军工集团趁机抛出了所谓“中国威胁美国后院论”，^①认为中国乘美国忙于反恐之机大举渗透拉美地区，直逼美国“后院”，威胁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权。

这种论调是美国新一波“中国威胁论”的延伸与升级，它反映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深层担心，认为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

^① 吴洪英：“中国威胁美国后院论”辨析，《现代国际关系》，2005 年第 12 期，第 8 页。

实力正开始转化成外交影响，认为中国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利用和这些地区的经贸关系开拓新的外交空间。在美国朝野中，尤其是那些对中国没有丝毫信任感的人眼里，是中国在利用美国的战略失误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全球化进程中中美关系不可避免的国际环境因素之一。

(三) 全球化背景下的非传统安全

随着非传统安全对国际政治格局影响力的与日俱增，能源问题、环境问题、恐怖主义等都会构成对中美关系的新威胁。在非传统安全方面，“9·11”事件后，中美在反恐等问题上已经进行了很好的合作，是合作伙伴。此外，全球化的进程使中美在更多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存在利益汇合点。中美在能源、环境、国际环境保护、打击跨国贩毒和犯罪、防治跨国疫病、信息安全等问题上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但这并不能说明非传统安全方面没有影响中美关系的变数。

中美关系的发展难以摆脱非传统安全特质的影响。非传统安全是从传统安全延续和扩展而来的，它与传统安全不是完全分离的，而是存在着相当广泛的联系。如果忽视非传统安全问题背后根深蒂固的传统根源，就会造成战略判断的模式，甚至会引起政府决策部门决策上的失误。在石油能源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中美两国都在实施一种传统安全的基本框架内的思维方式，双方在非传统安全事项上掺杂以传统的安全思考，造成一种囚徒困境的局面，都担心自身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让步、妥协会带来传统安全方面的利益损失。因而，未来非传统安全领域内的中美关系将更多地呈现出一种竞争条件下的合作关

系，它带给中美关系更多的将是互动复杂性的增加，以及两国关系中的更多参数因素。

三、周期性因素

美国国内政治也是中美关系起伏不定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周期性因素。美国的全国性中期选举每两年举行一次，改选全部众议员和三分之一参议员。每四年进行的大选，不仅改组国会，而且要选举总统。同时，选举也带来了总统与国会的权力交替。而这一周期性因素与其他周期性因素，如年度对台军售审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等叠加在一起，致使中美关系具有周期性反复的特点。

竞选与主政：美国总统在竞选时就开始考虑外交政策，而这些外交政策却往往不能兑现。由于选举的需要，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期间所发表的有关外交问题的讲话，很大程度上只是为迎合听众的兴趣、利益和倾向。竞选期间的一切言论，总统候选人都以不损害自己的竞选地位和最大限度地吸引选民为最高原则，而颇具争议的中美关系往往是竞选中的筹码之一。同样，国会议员考虑更多的是连选连任，因而主政立场与竞选立场可以相差甚远。

首任与连任：急功近利是总统在处理外交问题时的基本心理状态。新领导人主政之初通常希望尝试推行与前任有所不同的内外政策。新总统上任、同国会建立关系、建立内阁班子并获得参议院对重要官员任命的批准，往往要花费半年多的时间。因此，一个总统在其四年任期内真正能在外交上有所作为

的时间只有两年半。每届总统都争取在其一届任期内集中精力解决一两个外交问题，而把其他的外交问题排在议事日程表上很低的位置上，希望在其第二任期内能有较多的时间可以全身心地处理国际问题。若能连任，外交政策就呈现出明显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因为连任可以为两国关系省下与新政府的磨合期。

总统与国会：选举导致总统和国会中的权力交替。权力交替分两种：一是在同一政党之中进行交替；二是在不同政党之间进行交替，由民主党总统替换为共和党总统或由共和党总统替换为民主党总统。^①从理论上讲，前一种权力交替对政策的影响不会太大，因为出身同一政党的总统会在政治理念、政策诉求上有更多的共识；而后一种权力交替则会产生重大的政策调整，因为不同政党的候选人除了与生俱来的一些政治分歧、对外交思想的不同认识以外，更严重的分歧或许是由选举政治造成的。总统与国会的权力交替与相互牵制也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

四、偶然性因素

中美关系的历史反复证明，“乐极”往往“生悲”。每当两国关系好的时候，总会有某种不可预测的偶然事件发生，从而一夜之间改变好的气氛，使关系重新跌入低谷。其对中美关系

^① 刘文祥：“美国选举周期与总统国会关系探微-兼谈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3期，第87页。

破坏之大、影响之深，以至于一些长期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也不免滋生某种“历史宿命论”，对当前中美关系的“好”本能地保持某种怀疑。

围绕重要的国家利益，中美在每个重大事件上都显示出矛盾和对立的局面。明处的矛盾和暗处的实力竞争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实质。总结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中的危机大致可分为几类：

一是台海问题：如1992年9月，布什政府不顾中方的一再强烈抗议，公然允许对台出口150架先进的F-16战斗机，严重恶化了两国关系。1995年5月2日，美国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中美关系自此跌入建交以来的谷底。1996年3月，台湾海峡爆发了第三次台海危机，中美两国出现军事对峙等。

二是经贸问题：1989年6月，美国布什政府宣布对华五项制裁措施，使中美关系陷入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危机”。2004年初，布什政府将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不平衡牵扯到一起，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对中国施压。

三是人权等问题：1994年初，中美在“人权”、最惠国待遇、西藏和台湾等问题上剧烈“摩擦”。1995年上半年，中美在知识产权、“人权”、台湾等问题上再次“摩擦”。1998年6月底，美国众议院调查所谓中国自1979年与美国建交以来一直以“间谍”手段“窃取美国高科技和核机密”的情况，并在1998年12月底完成所谓“考克斯报告”。2003年4月1日，美国国务院发表《2002年国别人权报告》，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大肆歪曲。

四是突发事件：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用导弹袭击我国驻南联盟使馆，中美关系再次触及谷底。2001

年4月1日,发生了“中美撞机事件”。同时,美对台军售升级,中美关系又陷入低谷。

1949年以来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是一部频繁发生危机的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主要国家关系中,除美苏关系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两个大国之间曾发生过如此多、如此严重的冲突和危机。^①产生危机的根源在于中美两国综合国力发展的不平衡和实力的不对称。因此,中美两国应合作加强危机管理,通过建立战略层面的危机管理机制、危机处理的信息沟通机制、危机预防机制等措施,有效地规避和处理中美两国之间的各类危机。总之,避免因“小”失“大”,争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确保两国关系长期稳定所需要解决的另一关键性任务。

五、结语：矛盾与合作因素共存

结构性矛盾的存在,决定了中美关系的发展程度有其历史局限性。指望中美关系在近期内发展到美欧关系的程度恐怕不太现实。而中美关系中结构性合作因素的存在,则使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很难激化到发生军事冲突的地步。当前,中美关系较冷战结束之初更为成熟,在政治领域、军事领域仍存在着许多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因素。在国际体系层次上,美国将实力不断增长的中国视为其霸权体系的潜在挑战者,并对中国采取

^① 王缉思,徐辉:“中美危机行为比较分析”,《美国研究》,2005年第2期,第22页。

着眼于未来的“战略防范”措施；在国家利益层次上，中美政治、经济、军事关系错综复杂，但总体上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经济上，美国正在从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中分享利润。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资金和技术，拥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正渴望中国这个大市场吸纳其资金与先进的技术，并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来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这是中美经贸关系的大局和总体趋势。在经贸领域，中美两国的合作将不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中美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互补日益显现。目前，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两国之间已经形成了轻易拆解不开的利益共同体。

在安全上，美国反恐、反扩散、应对朝核危机等，都离不开中国的合作与支持。而且，中美两国在合作反恐、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以及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上合作的可能性会有所增加。这种在全球信息时代形成的特殊利害关系，从积极层面看，将使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水涨船高”的互助态势；从消极层面看，则将使双边关系表现出“唇亡齿寒”的共生状态。

中美关系有走向对抗的基因，也有继续走向合作的动力。中美关系面临两个前途：如果按照传统现实主义的思维行事，中美很有可能重蹈“大国政治的悲剧”；如果超越传统现实主义的思维，中美则有可能上演一出“大国政治的喜剧”。国家间关系的发展，虽然有客观的基础和利益驱动，但发展进程取

决于各方的主观努力。^① 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空间，归根到底不是取决于静态的“结构分析”，而是操之于两国决策者和两国人民手中，因而悲剧与喜剧取决于两国的战略家如何营造双边关系。中美关系中的相互认知既有消极因素，也有积极因素。^② 要使中美关系朝健康的方向发展，两国的战略家需要不断努力，抑制消极因素，防止中美关系落入“冷战思维”的误区，培养积极因素，保持最大范围和最大可能的合作，保持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与发展。

① Rosalie Chen, "China Perceives America: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pert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May 2003, Vol. 12 Issue 35, pp. 285—297.

② David Shambaugh, "Imagining Demons: the rise of negative imagery in US-China rel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May 2003, Vol. 12 Issue 35, pp. 235—237.

作者简介

- 陈玉聃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 陈剑峰 上海政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
- 周敏凯 上海同济大学法政学院
- 胡豫闽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
- 赵可金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夏立平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 倪世雄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傅梦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 蔡翠红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 潜旭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 潘忠岐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 潘 锐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